

中共广州市纪委办公厅文件

穗纪办字〔2017〕85号



中共广州市纪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 广州市纪律教育学习月反面典型 剖析材料的通知

各区党委、纪委，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市纪委各派驻（出）机构，委局各室（厅、部、办、组），市委巡察机构：

根据今年我市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安排，现将市纪委组织编写的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冯军违纪违法案，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违纪违法案，越秀区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齐小平违纪违法案，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

划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小兵违纪违法案，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段险峰严重违纪违法案，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赖布克违纪案等 6 起违纪违法案件剖析材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紧扣“讲政治、强党性、严纪律、守规矩”主题，紧紧围绕我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要求，充分运用反面典型案件剖析材料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做到讲规矩、守纪律，为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重要批示要求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纪律保证，以良好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 附件：1. 沉重的面具——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冯军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2. 穷途末路方知悔——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3. “五不知”的迷途人生——越秀区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齐小平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4. 错误“规划”人生的规划局长——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小兵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5. 错位的追求——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段险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6. 闪闪红星 缘何坠落——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赖布克违纪案件剖析



附件 1

沉重的面具

——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冯军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冯军出事儿了？不可能吧！”“是那个冯军吗？”2016年5月，当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军被市纪委从市政府办公厅带走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每天背着个双肩书包走路上下班、没有一点“领导范儿”的正局级领导干部竟是一个蛰伏多年、潜心敛财的贪官。洗得发白的短袖T恤、常年不换的褶皱皮鞋，住在70平米的出租屋里，连个私家车都没有……这一切竟然都是装的！谁曾想到，冯军“低调生活”、“高调示穷”的背后，是近乎病态的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经查，2002年至2016年4月，冯军在担任黄埔区政府副区长、越秀区常委、常务副区长、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广州教育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期间，因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间接或直接插手建设项目、工程承包等方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3000多万元等。目前，冯军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违法问题被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直以来，冯军都觉得自己有着优于他人的处世“秘笈”，对他来说，所谓“伪善”是一种能力和本事，是适应社会的“觉悟”和“开窍”，那些踏实、务实的人是呆子和傻子。就

是这种念头，让冯军沉浸在自己的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贪功求荣中不能自拔，用伪善的“面具”掩盖其贪腐之实，最终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

面具之初——快乐的舞者

在很多人眼里，冯军是才子。上个世纪80年代，他先后获得著名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学士学位和建筑设计专业硕士学位，成绩优异。在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他怀揣着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梦想，来到了广州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在广州市规划局工作期间，因为学历高、业务精、有干劲，冯军很快脱颖而出并被委以重任。广州珠江新城、琶洲会展、新机场、南沙港，冯军不负重望，为诸多重要城市建设项目投入了智慧和汗水，交出了出色的“成绩单”。据冯军自己说，那段积极奋进、务实开拓的工作时光和人生经历非常难忘，他感到充实而快乐！

很快，冯军当上了市规划局勘测管理处、规划管理处处长，实权在握，“突然间好多人围着我转，几乎天天有人约请吃饭，求我办事儿的人不断，手信礼品不断、红包礼金不断，我开始体验到审批权力的种种好处！”回忆起当处长之初的思想变化，冯军感慨地说，“我很享受权力部门带给我的这种人求于己、好处不断的氛围，思想认识开始出现偏差，不是把

权力当成一种责任，而是当成荣耀、虚荣，人生观开始贪图享受和享乐，这为我后来做错事种下了隐患。”冯军原本以为人生最快乐的，就是像他大学时候的精神导师日本旅行画家妹尾河童那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每一个难忘的地方！直到他审批一个项目，就有人立刻送来20万现金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挣钱如此容易，敛财如此便捷，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知道，原来人生有更加刺激的“快乐”！

“权力是一种人们不愿提及的宗教！”这是冯军在被审查期间写下的一句话。当权力与利益相遇，当金钱哲学爬上信仰的高地，冯军的内心便再也装不下“权为民所用”的承诺，再也记不起“利为民所谋”的誓言。冯军曾自我剖析道：“我当着科长想着当处长，做着处长又想着当局长，看着大领导身边围着更多的人，能办更大的事，我很羡慕他们的风光和权力！”然而，面对组织对党员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标准，他必须拼命掩饰自己内心对金钱的狂热；面对群众对“为人民服务”好干部的期待，他只能把别人送他的7万块的西装偷偷放在衣柜里；面对纪检监察机关越来越大的查处力度，他只能把权力带来的快感悄悄地掩藏起来不敢释放！为了“再上一步”、为了“不被查”，为了接近更大的“猎物”，“聪明”的冯军选择伪装，戴上必不可少的假面具，走向了自己的面具人生。

面具之迷——贪婪的私欲

如果说权力与金钱的初次邂逅，让冯军品尝到了甜头。那么 2002 年，当年仅 40 岁的冯军被提拔为黄埔区副区长时，他更体验到了权钱交易的快感！在面具保护下，冯军的胆子越来越大，权钱交易到了疯狂的地步。

2002 年，冯军在黄埔担任副区长期间，经人介绍与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申某某结识。申为人精明、出手阔气，深得冯军信任。2007 年，因为得到冯军的全力支持和帮助，申某某的公司在没有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省某轻工职业学校教学楼的施工项目。冯军的办事力度这么到位，申自然也很“会做”。除了请冯军吃饭感谢，申某某还准备了厚礼答谢冯军，仅这个项目，申某某就分三次感谢冯军的“大力支持”，每次都是上百万的现金，冯军没有推脱，直接笑纳了。从那以后，冯军就成了申某某的靠山，“只要搞定冯军，就能搞定一切”。对于申某某的请托，冯军从不拒绝，并且特别尽心尽力去办，能直接插手的事情或者项目，就打电话过去安排；不熟悉的项目，就想尽办法斡旋协调。申某某每次拿到工程项目后，就会用“厚礼”对冯军表示感谢，据统计，申某某多年来贿赂冯军的钱款达 1100 多万元人民币。

“雁过拔毛”，常用来形容贪婪。冯军则更甚，“雁”还未到，便开始拔“毛”！2013 年，冯军挂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期间，主管广州教育城建设项目，该项目资金预算达两百多亿。这么一大块“肥肉”，各种项目公司都盯着，想方设法和冯军搭上线。在一个饭局上，申某某请冯军帮自己的朋友拿到教育城的相关设计项目，冯军满口答应，而且在没有完成请托之前就收下了由申某某转送的500万现金，面对一捆捆的巨款，冯军没有一丝恐惧和担忧，全数收下了。后来，由于竞争太激烈，申某某朋友的设计招标没能如愿中标。冯军不想退还已拿到手的钱，就对申某某说：“后续教育城还有200多亿的项目，赚钱的空间更大，放心！我会时刻关注、极力关照的。”

低层次的欲望恶性膨胀，激发了冯军功利主义的权力观，让他对物质产生了变态的占有欲。广州某物流有限公司的周某某，是冯军在黄埔区担任副区长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2002年，冯军在其仓库建设审批上给予了帮助，周某某当时就给了100万的酬金。2007年的一天，周某某请冯军一家吃饭，冯军话中有话地说想买辆本田飞度给妻子朱某某接送小孩上学用，并问周某某是否认识卖本田汽车的人。周某某会意地接过话说，本田质量不好，还是丰田的好些。不久，他买了一辆红色丰田卡罗拉送给朱某某。一敲即中，冯军的胆子和胃口也越来越大。2009年，他想把珠江新城房子的贷款还了，就让妻子朱某某把还贷还差20万的事儿告诉了周某某。几天后，周某某就送来了20万现金。对于自己的索贿行

为，冯军觉得，“我想之前帮他搞定仓库的事儿，让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

负责此案的纪委同志说：“冯军从第一次收受礼金的忐忑，变成后来百万贿款入袋的坦然，他在贪腐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已经把办事收钱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次敛财成功，多年来没被发现，冯军体验到了面具的魔力，伪装的好处，体会到了面具人生所带来的强烈的获得感、满足感、欢乐感乃至成就感。

面具之殇——扭曲的亲情

“是谁，在十年后为你打开家门？是谁，在入睡前和你共用一盏灯？”这是冯军在忏悔录中的自问。相信在其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母亲，也想卸下面具投入儿时温暖的怀抱；对自己的妻子，也想拆掉伪装说说掏心窝的话儿。但面对家人的各种“需索”、高低“期望”，他选择了妥协，选择了纵容，最终被亲情绑架，走上了不归路。

据冯军的弟弟冯某说，他们家曾经召开家庭会议，明确要求：“老大，当好你的官，让你弟多赚点钱！”“老二，赚好你的钱，让你哥当更大的官！”2011年，冯某一直表示想在越秀区买个好房子，冯军利用其担任越秀区常务副区长的职务便利，为广州某房地产发展公司董事长谭某在楼盘地

下空间规划调整方面提供帮助，按照冯军的授意，谭某将自己位于越秀区中心地段的某楼盘的一间户型、朝向、面积都极佳的房屋以房屋正常售价的 50% 出售给了冯某。

冯军还有一个“好”妻子朱某某。比起冯军的低调，朱某某的“高调”显得有点扎眼，她可以花费数十万元在美容院开个美容卡，也可以随时阔绰地购买与她收入不相符的各种奢侈品。她在珠江新城开的瑜伽馆，不但请一个工程老板出资 30 万，还动员所有与冯军合作的、希望有合作的老板们成为会员，办理会员卡，圈钱圈得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更有甚者，她借给自己父亲办丧事的机会，在老家大摆酒席，向相关利益人收取“白金”。酒席的饭钱也是叫一名工程老板去买单结的帐。贪婪至此，无以复加。对于妻子的作为，冯军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发之后，冯军感慨道，“回顾我犯罪的过程，不但自己后半生要在牢狱中度过，而且让家人子女承受巨大的压力，家中尚有两位 80 多岁的老人不能奉养，我和弟弟都要身陷囹圄，我无言以对、心痛无比，难受极了。”所谓的“光宗耀祖”，所谓的“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在这场以“家”的名义积累财富的旅途中，让冯军更加迷失了方向，再没有回头路。

面具之后——迷失的灵魂

冯军说：“我有好多面，在领导同事面前一个样，在家人

亲人面前一个样，在老板面前又是另一个样！”多年的磨练，让冯军掌握了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台上道貌岸然、台下另一副嘴脸的高超表演艺术，成为了衣着简朴、生活节俭、为人低调的伪装者！秘密越来越多，戴上的面具越来越厚，蒙蔽组织群众屡屡得逞的冯军，积累了常年潜伏党内的经验，而代价就是长期处于虚假的生存状态和极度的精神恐惧之中。

2014年，冯军听到一些“风声”，为了逃避组织的监督和调查，他和妻子开始对财产进行“自查自清”，企图用各种方式转移财产。为掩人耳目，自2015年开始，冯军又绞尽脑汁和妻子一起编造虚假微信记录，粉饰罪行，全力给自己打造一个清廉的形象。“这个月开销很大，你给我的2000元零花根本就不够！”，“你花钱不要大手大脚的，我还想着能省点钱买一辆好点的车自己开开！”在冯军夫妻的微信记录里，每天都有这种“力证”夫妻财务支出没问题内容。

“每天都要编这么长的微信，我觉得很烦，有时候就不配合他，他就自己拿着两部手机，自编自导两个人的对话！”面对冯军这样疯狂的举动，妻子朱某某也开始不耐烦。

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粉饰，秘密要用更厚的面具来掩盖，连续两年的自编微信，我们似乎能够看到面具背后那个动辄心惊的弱者以及表面平静之下那颗瑟瑟发抖的内心。“收的钱越多，我的内心越扭曲、灵魂越不干净”，冯军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到。钱财来路不明，一旦败露便会自由不再、事

业尽毁、待遇归零、家人负累、名誉扫地，原本的面具已不能带给冯军足够的安全感，他忧心忡忡，不能自己，将自己的灵魂锁闭在这磐石一样的面具之中，犹如困在一座暗淡无光的囚牢，备受煎熬。“这些老板朋友，交换的不仅是我的权力，更是我的名誉、地位、身家乃至性命，可悲的是，人生不能重来！”冯军的醒悟为时晚矣。

电视剧《伪装者》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不知道在编完微信，夜深人静之时，冯军有没有揽镜自照，分清楚哪个是戴着面具的自己，哪个是摘下面具的自己。面具一旦戴上，就再也无法摘下，只能戴着越来越厚的面具蹒跚前行。

面具之问——沉痛的反思

回顾冯军的堕落轨迹，他也曾有过美好的梦想和创业的激情，也曾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究竟是什么让他伸了不该伸的手，动了不该动的心，走了不该走的路？究竟是什么让他在正风反腐的空前高压下，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是党性丧失，悄启腐败之门；是漠视法纪，暗植贪欲之种；是心存侥幸，执迷歧途之中；是监管缺失，游离制度之外。《增广贤文》有训，“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在终于算清这一事关自由、事业、家庭、经济、名誉的账本后，冯军只能哀叹“往事不可谏”，

多少本应“知足”、“知止”的机会从自己手中白白流逝。留给我们的，除了深深的痛惜，还有深刻的启示。

再多的角色也不能忘记初心。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刚当干部时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要发财可以合法发财，自己经营，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智慧致富……为什么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戴着假面具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干事自然有底气，自然有高度，自然不会做那些充满了诱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很显然，冯军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他什么都想要，结果非但没有守住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反倒错误价值观、权力观和名利观的驱使下，戴上虚假的面具，萌生纵好图利、沽名钓誉的妄念，最终害了自己，害了家庭，更给组织造成了恶劣影响。“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丧失理想势必自毁人生，放纵欲望终会迷失方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都不能忘记公权姓公不姓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只有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才能行稳致远，守住为政之本，守住政治生命的安全线。

再巧的伪装也逃不出天网。纸终究包不住火。但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都迷信自己会是例外。冯军之所以在十八大之后仍然敢不收敛、不收手，是因为“围猎”的陷阱让他欲罢

不能。不保住权力，不攫取更大权力，就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关系人的欲望；**是因为**自律的缺失让他丧失敬畏。在权力的光环下，冯军迷失了方向，他手中的权力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异化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挥霍纵欲的资本和权钱交易的筹码；**是因为**面具的掩护让他心存侥幸。殊不知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只有从一开始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侥幸期待最坏的结果不会到来。百般算计不如遵规守纪。冯军的教训告诫我们，演技再精湛的伪装者，在法纪的“照妖镜”前，也会现出原形。党员干部唯有坦诚相待，当好组织面前的“透明人”，安分守己，做好纪律面前的“老实人”，不以“小事无碍”放纵自己，不以“下不为例”原谅自己，不以“无人知晓”麻痹自己，方能光明磊落、坦荡人生。

再大的信任也不能代替监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冯军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前后 15 年间，他从收受红包礼金到违规申报个人有关事项，再到涉嫌受贿犯罪，一路带病、一路前行。冯军再善于伪装，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破绽。如果刚开始发生问题就有人对他及时拉一把、大喝一声，他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好人主义盛行，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及时指出同志的缺点错误，最终是害了同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我们不用像革命先烈那样天天面对生死考验，无非是去开展

批评、得罪点人，如果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我们这个党怎么能有战斗力？”殷鉴不远，各级党组织都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把党内监督的主体责任贯穿到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出责任和担当。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要让纪律严起来、落下去，充分发挥纪律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两方面作用。要限定权力范围、厘清权力边界，科学设定权力的运行程序和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胜利。冯军说，我很后悔从政，也许一直当老师更好。“你要这么多钱，到底要干什么？”对办案人员的提问，冯沉默不语。“你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冯低头落泪。谁也不知道彼时彼刻，冯军究竟在想些什么？是青年时期的热血抱负？还是妹尾河童那说走就走的旅行？伪装只会使自己趋向荒芜，再亮的光也照不进心的门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摘下那副沉重的面具。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激昂和困惑交织在很多人的心中，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那么清楚，看目标远不如看底线那么明白。无论怎样，都要始终牢记权力来自于党和人民，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事，做忠诚于党、表里如一的好干部。唯此，才能活得踏实，过得安心。

附件 2

穷途末路方知悔

——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走是穷途，逃是末路，如果走了还不自首的话，那绝对是死路。只有投案自首，依靠组织，才是最好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题记

2013 年 8 月 20 日下午，广州市纪委定期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广州市纪委对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查处情况。此前数月，已经有非官方消息传出，“王雁威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并失踪”，对于王雁威去向的传言不断，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2015 年 4 月 22 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 100 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缉令，王雁威赫然在列，编号为 A-10321/12-2014。2016 年 6 月 12 日，广东省纪委公布了王雁威被缉捕归案的消息。

随着王雁威的归案，其“失踪”“外逃”以及违纪违法的事实也一一被揭开……

逃亡之路：从一呼百应到寄人篱下

2013年6月的某一天，时任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上午还在单位正常办公，下午突然不知所踪。据传，王雁威失踪前曾以身体不适需要住院治疗为由向组织“请了假”。更蹊跷的是，和王雁威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妻子徐某华。王雁威和其妻子双双失联，引起了有关部门特别是市纪委的高度关注。市纪委迅速展开调查，不到两个月，王雁威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违纪事实相继浮出水面，而且，大量证据表明，他畏罪潜逃了！

说起王雁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胆子大，有本事，说一不二，不好惹。这种夹杂着褒贬不一的评价，在他落马之后变成了一片唏嘘。回看王雁威的人生轨迹，在花都区工作生活的近30年时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计生干部开始，先后担任过区府办主任，花东镇镇长、镇委书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最后担任区政协主席，可谓顺风顺水。一开始，他也曾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以突出的成绩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但随着官越当越大，他的思想也悄然变化，贪欲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让他开始目无纲纪、肆意横行，什么事都敢办，什么钱都敢拿，甚至主动利用职务便利敛财。据花都区的干部反映，在私底下或者小圈子里，别人都称呼他“威哥”，他在花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这种“大哥”

的地位，很大程度源于他担任了 10 年之久的区委组织部部长，手握干部提拔“大权”，因此，讨好他、巴结他的人常年门庭若市。对于王雁威来说，干部提拔明码标价、干部任免“一言堂”，变成了理所当然。经他提拔的干部也自然成了“他的人”，他要办点什么事，自然能得到一呼百应，因此，他的贪欲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2013 年 5 月，花都区某工程项目腐败曝光，风传区里多名干部涉案。王雁威也隐隐感到了压力，但他还是心存侥幸，觉得火应该不会烧到自己头上，直到他的侄子王某森被带走调查，他才开始慌乱起来，四处设法打听案情，并联络几个重要“关系人”商议对策。王雁威意识到自己违纪的严重性，但选择的不是向组织主动投案，而是一走了之，带着老婆开始了逃亡生活。在徐某、毕某等人的帮助下，王雁威夫妇先是在花都区、清远市等多地躲藏，之后又逃往衡阳、延安、青海、郑州、登封、内蒙古的包头和临河等，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漫无目的地亡命奔走。期间，为了迷惑组织和躲避追捕，王雁威写了一份要求辞职出国治病的信，交给社会人员罗某强寄给国外的朋友，再转寄国内，造成已经出逃国外的假象。

在逃亡过程中，为了寻求精神安慰，王雁威变得更加迷信，逢庙烧香、见佛磕头，妄图靠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躲过难关！

但是，求神拜佛并未让他们如愿。逃亡一年多后，王雁威夫妇最终在社会人员毕某全的安排下躲到了某小区的一栋洋房里，再也不敢出门，直到 2016 年 6 月被抓获。据王雁威夫妇说，他们几乎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因为害怕暴露行踪，他们不用手机，不打电话，不敢出门，连客厅的窗帘都不敢拉开，平时买菜购物都靠请来的保姆。因为寄人篱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归案后，王雁威妻子声泪俱下向办案人员说：“有时候站在窗台上，会偷偷的拉开窗帘看外边，看到外边人家拣垃圾的人都比自己好，最起码人家有自由。那种心态真的是很痛苦，整天以泪洗面。”更让夫妻俩感到害怕的是，“帮助”他们的毕某全，开始利用他们的心理压力，用各种借口向他们要钱，要求“回报”。据办案人员介绍，“他们被人变相敲诈，一年多的时间里，谢某（他曾经的司机）找他向他女儿‘借’了 450 万元，毕某全（收留他藏身）找他向他女儿‘借’了 200 万元。”

逃亡的日子让王雁威夫妇不堪回首，王雁威对办案人员说，“可以说（我们）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就算有人帮助收留，也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在别人家里要看人的脸色要听别人的使唤，确实是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苦难……生不如死。”

腐败总是最怕暴露在阳光下。王雁威为了躲避组织的监督，一方面，长期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将实际属于其

个人或家庭所有的别墅、商铺等房产分别由其连襟、小姨子、侄儿等亲戚名义代持；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通过伪造身份证件等为将来留后路，早在1998年，王雁威就为其个人及妻子、女儿办理了一套假身份证，并用该身份证办理了港澳通行证。

外逃不是腐败的“安全岛”。正如王雁威落网后感悟的那样，“走是穷途，逃是末路，如果走了还不自首的话，那绝对是死路。只有投案自首，依靠组织，才是最好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贪腐之路：从“全家腐”到“全家哭”

“没有见过这么贪婪和不知耻的人！”办案人员在谈到王雁威时，对王雁威的贪财和唯利是图印象深刻，“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在王雁威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调查，王雁威经常主动向其帮助过的社会老板索贿，有时看中某个楼盘觉得不错，就直接电话跟别人“借钱”、一开口就要几十万。案发后，清算王雁威被扣押的现金、房产等家庭财产价值达数千万元，其中大多数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合法性。王雁威受贿所得大部分用于购置房产、商铺和土地等，因为数量太多，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某些房子的具体地点和价值。早在1998年王雁威担任花东镇党委书记开始，权力就成了他财运亨通

的重要工具。比如，2001年，花都某水泥厂的承包人王某，因为合同到期来找王雁威帮忙续期，王雁威认为这是个捞钱的机会，就让当时的花东镇办公室主任何某敲了王某一笔，“一开口就要80万”，何某被王雁威的贪心吓了一跳，几乎想辞职不干了。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或者帮别人谋了那么多的利益，帮了别人，拿一点，要一点，好像也应该的。”自从当上了区委组织部长后，王雁威发现钱来得越来越容易了。从1999年至2012年期间，区人大原副主任毕演周为感谢王雁威在其职务晋升及亲属、朋友的工作调动、入编等问题的帮忙，逢年过节都向王雁威及其家人送钱，累计达80多万元。此外，随着职位越来越高、权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王雁威更加肆无忌惮地帮助多名亲属包揽项目工程，牟取巨额非法利益，其中就包括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侄子王某森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谋取巨额不当利益，王某森则投桃报李，给王雁威及其女儿送去巨额款物。

家风一破，污秽尽来。在王雁威的影响下，其亲戚王某森、梁某灿分别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利用王雁威的权力和影响力在花都大肆承揽工程、倒腾土地等谋取非法利益，王某森、梁某灿则向王雁威及其家人奉上现金和房产达数百万元。由于家风不正，在花都某机关工作的妻子徐某华也夫“唱”

妇“随”伺机敛财。据办案人员介绍，徐某华有时候开会碰到机关干部，就主动暗示人家“某某，你的提拔要不是我们家老王说话，你是没机会的！”这些干部不得不去取钱，两三万不等及时给她送去。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王雁威的女儿王某瑶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2008年，王某瑶用王某森、梁某灿等亲戚的钱开了一个酒庄，利用王雁威职务影响力向一些花都区的区属单位和私营企业等大肆推销酒水，王雁威妻子则将别人贿送的各类酒水、虫草等贵重礼物通过酒庄销售变现。短短几年时间，该酒庄获利竟达1900多万元。据办案人员介绍，王雁威外逃后，其女儿在取保候审期间，居然还敢找其父关照过的转制水泥厂老板明目张胆张口要钱。

经查，王雁威违纪违法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元，王雁威的妻子、女儿、侄子、连襟等几乎全部涉案，王雁威在个人忏悔中写道，“（我）由一名一般干部不断晋升至厅级，算是事业有成，本应非常自豪；膝下有儿（收养一子）有女还有孙，一家有老有小，本应非常幸福；自己干了几十年，今年正好是换届够龄退下来，本应平安着陆享天伦，这些本应的东西却因为没有好好珍惜，没有好好把握，而痛失在自己的手中。不但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而且给家庭造成无尽的痛苦。”

悔恨之路：从执迷不悟到幡然醒悟

2014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天网 2015、天网 2016、天网 2017、“红通名单”、猎狐行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反腐重拳、雷霆出击，随着惩贪治腐和追逃防逃力度越来越大，腐败分子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王雁威夫妇逃亡了整整三年，但最终只是穷途末路。在逃亡过程中，王雁威的妻子也曾劝他主动自首，可王雁威错误认为自己的落马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只要能躲过这阵风头就没事了。2015 年 4 月，当王雁威得知自己弄巧成拙，上了“红色通缉令”名单之后，懊悔不已。王雁威坦言，“我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自己已经摆上了红通，意味着通缉的最高手段，已经用在我身上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实践证明，这样做一个是蠢的，一个是错的。因为是欺骗组织本身就是错的，极其错误的。”“其实当时根本不应该走，如果当初不走的话不会是这样的，自己出来积极面对，该判十年就十年，二十年就二十年，在监狱里总知道有个人在里边，像我们跑出来，家里人也找不到我们，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的这次潜逃经历，彻底印证了古人所说的‘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名言哲理”。

“因为自己一错再错，造成吃这个苦果，自己酿的苦酒

自己喝。”“我一开始还是干劲十足，想着为老百姓多谋利，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可惜这份理想和信念并不是很坚定。”导致王雁威自讨苦吃、自食其果的正是他理想信念的蜕变和动摇。王雁威在个人忏悔中剖析自己的蜕变，“（我）被权力、成绩冲昏了头脑，从而理想开始动摇，信念开始蜕变”。一方面，在权力面前没有做到慎独，特别是担任一把手后，变得忘乎所以，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呼风唤雨谋取私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利益面前没有做到慎微。“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红包，王雁威自认为是传统习俗、礼尚往来，从一开始的几百元、几千元到后来三五万、甚至几十万，也照收不误，像温水煮青蛙，贪欲一步步膨胀，最终滑向了腐败的深渊。痛定思痛，但悔之晚矣。

镜鉴之路：恪守忠诚干净担当

在长达数十页的忏悔书中，王雁威写道，“自己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利用职权，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是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是初心的忘却，没有守住党的纪律和规矩，没有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

王雁威党龄近40年，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老党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还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在其入

党之初、宣誓之时，相信对党对组织也是一片忠诚与赤热，但是，党性修养并不随着年龄自然增长。实际上，当领导干部身居重要岗位、手握重要权力、掌握重要资源，赞美之词滚滚而来、谄谀之人簇拥左右时，当想干什么就有人跑前跑后，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往往就有政治免疫力丧失的风险隐伏其中。从王雁威的沉痛教训中，再次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政之路有风光更有风险。

必须不忘初心，清醒清白做人。王雁威说，他1978年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一开始也是工作干劲十足，脑子非常清醒，一心就是为工作，一意就是为做事，别无他想，更无他念。但是随着职务的变化和晋升以及环境的变迁，思想和境界也随之产生变化，尤其是在花东镇任党委书记的后期和当上了花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之后，大权在握，忘乎所以，理想信念开始动摇，逐步忘记了为谁掌权，为谁执政，为谁服务，“相反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地位作为光宗耀祖的资本”。领导干部一旦丧失慎微慎初，老是想着个人想着家人，就容易被权力和利益冲昏头脑，其离蜕化变质也就不远了，从“收一点无所谓，捞一些没问题”慢慢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不忘初心，行稳致远，方得始终。

必须依法办事，规规矩矩从政。王雁威当上花东镇党委

书记和区委组织部长后，就有点居权自大，“认为自己是一把手，在权力面前飘飘然”，在研究决策重大问题时，总是以自己意见为主，经常一个人说了算，破坏民主决策的规矩，美其名曰“要对单位负主要责任”，这种失去敬畏失去监督的做法，为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开了绿灯、种下祸根。王雁威反省道，“只要你大权独揽，就等于一块肥肉，苍蝇就会围着你转，老板也好，干部也好，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输送利益和好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慎独慎微，敬畏权力，依法办事，规矩为官，自觉接受监督。

必须相信组织，忠诚干净担当。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成长成才都离不开组织的教育和培养。王雁威在忏悔书中写道，

“2013年5月底，我的侄子王某森被市纪委带走调查，我怕被连累和牵涉，竟然对组织不辞而别，一走了之，且一走三年，背叛组织，给组织添麻烦，给组织抹黑，给家人和亲友带来极大的伤害。”王雁威最终认识到，“只有相信组织才能拯救自己，只有依靠组织才能找到出路”。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王雁威自称，“（自己被组织找到时，）只剩下一条裤子，最后要洗要换，都是组织帮助买才有得换、才有得穿。”贪取再多不义之财，终究无益身心，不过

是自毁前程、自掘坟墓！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慎终如始，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敬畏组织、敬畏权力、敬畏法纪、敬畏人民，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只有始终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才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一生平安！

附件 3

“五不知”的迷途人生

——越秀区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齐小平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2016年4月1日，愚人节，越秀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齐小平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休息间，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面对门外的调查人员，齐小平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才是“愚人”，他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茫茫然、懵懵然，再也找不到归路。就在这一天，齐小平被市纪委带走调查。5月3日，市纪委正式发布消息，齐小平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齐小平在忏悔书中写道：“这段时间经常夜不能眠，一幕幕往昔的场景在记忆中回放，又在记忆中迷失，翻来覆去，总感觉找不到答案，又好想找得到结果。看得到现象，望见了尽头，为何代价来得如此沉重？又会得到如此结果？”反省何等深刻，可惜为时已晚！

齐小平出生在军人家庭，20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因表现出色受南海舰队通报嘉奖。26岁转业到黄埔区人民法院后，从最普通的书记员做起，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刑庭庭长、经济审判庭庭长、副院长等，在自己的刻苦努力和组织的关心培养下，44岁任黄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成为一名手握大权的市管领导干部，可谓意气风发、人生得志。然而，2006

年到越秀区任职后，齐小平完全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言，逐渐迷失在贪欲之中，大搞权钱交易，为自己为他人捞好处，最终在贪腐的“不归路”上愈走愈远。经查，齐小平在担任越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越秀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期间，公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与公款旅游活动，违规使用公务车辆，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用公款购买高档酒水并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标、工程款结算、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款共计人民币 600 多万元。2016 年 7 月 14 日，齐小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目前，已移交司法机关作进一步侦查，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制裁和漫漫的铁窗生涯。

喧嚣过后，繁华落尽，痛定思痛，始得清明。齐小平留给自己的，只有捶胸顿足的悔恨。他描述道：“悔字竖心旁，一个每天的每，它是在告诫人们，也告诫自己，每时每刻在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折磨自己，度日如年，食之无味；恨字告诉我，恨自己，怒己不严，恨自己，怒己不争，恨自己，怒己不醒”。反思齐小平的迷失之路，可谓是“五个不知”：不知恩、不知足、不知惧、不知交、不知亲，就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不知不觉沉沦在别人设计的权钱游戏中，迷失了人生的正确方向。

不知恩，初心不再、党性迷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高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每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入党时都举过拳头，热血沸腾，都有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有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每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的辛勤教育和培养，离不开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关怀。剖析齐小平的蜕变之路，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懂感恩”，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利益诱惑面前，党性原则丧失，贪欲之心膨胀，赤子之心不再，感恩之心不存，最终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

翻开齐小平的入党志愿书，时年 27 岁的他写道：“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接受党的直接培养、教育，而不是图名、图利或者为自己捞到别的好处”。一个信仰坚定、立志为民的热血青年跃然纸上，那铿锵有力的誓词言犹在耳。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当他在组织的关心和信任下，从基层一步步走向领导岗位，随着职务升迁，手中权力变大，拥有人脉更广，放松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抛弃了自己当年的理想信念，忘记了组织的信任和期待。他自我剖析道：“自己参加组织的政治学习，不是请假，就是借故退席，逐渐对政治学习产生僵化思想，总认为是消磨时间、不实在”。殊不知，最不实在的是他自己，理想

信念和党性观念的滑坡、动摇，让他看不清自己的来路，看不到人生的正确方向，看不到组织和人民的恩情。尤其是竞争越秀区常务副区长落选后，齐小平深感仕途受挫，极度失落，意志消沉，干脆动起歪脑筋，从金钱、美色、享乐中寻求补偿。他在被审查后才幡然醒悟，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不起组织。他说：“想起这么多年组织培养自己不容易，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和成本，而自己在思想根源上出了问题，不懂得知恩图报，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也毁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基础。感觉到很快自己将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特别地游离和无助，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下去”。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离开组织的教育，就会得精神上的“软骨病”，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健康成长。齐小平案再一次证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不会随着职务的提高而自动增强，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理论学习，不断补足理想信念这个精神之钙，时刻牢记对党的承诺，时刻秉持赤子之心，时刻怀着感恩之情，才能拥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站稳脚跟。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该经常扪心自问，赤子之心还在吗？感恩之心还有吗？不忘来路，不忘党的教育培养、群众的殷殷期望和一路的奋斗历程。只有常常回望初心，时时擦拭初心，自觉把个人前途命运融入党的事业大格局之中，

才能固本培元，健步远行。

不知足，唯利是图、权力迷失

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在齐小平的从政道路上，2006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他调任越秀区政府副区长，手中有更大的权力。随着地位的提升和环境的改变，齐小平开始对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不满足，认为身份变了、地位变了，也该讲究生活品味和质量，也该好好享受享受了。基于这种心理，一贯谨慎小心的齐小平开始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无视党纪国法，违规干预工程招投标，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在贪腐的路上越滑越远。

定期收取“保护费”。齐小平在分管城市管理和环卫工作期间，利用职权大肆敛财，满足贪欲。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在家坐等，而是主动出击，每月召集越秀区市政道路环卫保洁工程的各公司负责人到中山一路“潮濠酒家”、珠江新城“泮江酒家”、二沙岛“陶苑酒家”等高档酒店开“座谈会”，逢年过节更是专题“慰问谈话”，打着工作的名义，听听汇报、作作讲评、下下指示，这样不仅吃山珍海味、品高档美酒，“会后”还能笑纳各种礼品、现金，可谓一举多得，赚得“盆

满钵满”。多次给齐小平送钱的广州万家美公司老板张某供述：“齐小平是越秀区道路保洁中标项目的主管领导，我承接的项目能否继续中标及完成状况评判，他有很大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决定谁能中标，我送钱给他，一方面是希望他以后能继续关照我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希望他在日常工作中不要为难我，如果管的太严我很有可能赚不到钱。”齐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些老板看中其手中权力有求于己且不敢得罪自己的想法，收受老板们的“进贡”，以权谋私，贪婪索贿，乐此不疲。

插手招标“开暗道”。“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在收取企业老板们的贿赂后，他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和规定之上，完全无视党纪国法，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尽心尽力为老板们谋取利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广州某某清洁服务公司是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小公司，完全没有保洁工作经验，尚不具备保洁资质和实力，其经营范围也不符合环卫保洁项目要求。2007年越秀区道路保洁项目第一期招标前，齐小平特地吩咐时任越秀区城管局局长邱某“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让某某公司中标”，最终强行让该公司中标。2009年越秀区道路保洁项目第二期招标，齐小平为了再次让该公司继续中标，无理否决了区城管局呈报的原招标方案，亲自上阵，在招标方案中刻意为该公司量身定制各项招标条件和加分指标，让本来不符合资质的该公司入围并最终中标。

为表示感谢，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先后送给齐小平 85 万元。

滥用职权“打招呼”。除了利用分管项目的权力谋私外，齐小平还通过为公司老板们打招呼、传话，利用职务影响插手干预有关重大事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广州某建筑设计公司老板敖某想做越秀区解放中路安置房勘察设计项目，给齐小平送上 100 万元贿款，此时齐小平已调任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不再分管具体项目。对此，齐小平亲自给区国土房管局局长胡某打电话，要求把这个项目给该建筑设计公司做，后来果然将项目“落实”给敖某中标。胡某供述：

“这个事情既然齐常委已经吩咐下来，我会尽量落实领导指示”。在谈到为什么违规将项目给该公司时，胡某说：“虽然齐小平不分管我们国土局，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是区委常委、是区委班子成员，在区里很多事情上都有决策权，领导很多时候可以影响到我个人的前途和国土局的考核，所以我会落实”。齐小平除收受“老板”贿款，还收取下属李某某贿送的现金和购物卡，并利用职务之便，为李在职务升迁上提供帮助。对此，齐小平后来自己总结道：“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指导上下级单位都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我时不时给有关单位和个人说人情打招呼，实质上违反有关组织原则，破坏了组织应有的纪律，干扰了正常工作程序和秩序”。

党员领导干部出问题往往出在自己手中的“权”上。正确的权力观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准则、道德模范和立

身之本。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权力观，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对谁负责的问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齐小平悔恨道：“自己总觉得贪点小便宜，没什么问题，不算什么大事。所以总想着捞一点好处。现在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晚上都睡不着，后悔，真的后悔，后悔死了，现在算算账，真是划不来”。他在自我剖析的第一条就深刻反省道：“不能贪，哪怕是有利益关系人的小恩小惠，都不可占小便宜，防微杜渐，贵在自我约束，不要利用职权为利害关系人办事，更不能捞取好处”。党员领导干部一旦对党纪国法、对手中权力失去敬畏之心，以权谋私，突破法纪底线就是迟早的事。齐小平案件的发生，也暴露出越秀区相关部门在权力运行和监督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齐小平正是利用这些薄弱环节和漏洞，绕开民主集中制，插手工程项目，从中谋取私利。因此，要针对权力配置和结构、制约与协调、透明与监督、行使与追责等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要加大工程建设项目从申报立项到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信息公开力度，使项目建设情况更加透明、公开地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要进一步规范招标代理机构在工程量清单和标底编

制过程中的行为，防止招标代理机构与招投标双方之间私下勾结、暗箱操作、操控招标结果，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不知惧，顶风违纪、政治迷失

党的纪律和规矩，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和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后，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各级党委三令五申严明纪律，但齐小平对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丝毫没有敬畏之心，仍然抱着“老皇历”、“旧习惯”，把单位当成“自留地”，在公款宴请、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问题上处处踩线，完全不收手、不收敛、顶风违纪。在分管越秀区环卫局期间，他把会议开到了高档酒店，定期组织公款宴请；任区委统战部部长后，仍经常到天河区珠江新城“唐厨”等高档消费场所大吃大喝；2011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仍多次安排司机使用公务用车接送妻子和女儿上下班、去机场、逛街、看病及其个人办私事，长期公车私用；2016年1月，公然带领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某等5名下属到吉林长白山公款旅游，全程没有任何学习交流活动，费用均从区委统战部公用经费中开支；在被组织调查前，还安排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公款购买轩尼诗XO、蓝带、茅台酒等高档酒水准备用于公务接待。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齐小平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和规矩，

影响十分恶劣。

在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齐小平为何对中央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呢？在组织调查中，他也承认：

“我对上级各项禁止性规定是知道的，越秀也出过一些事情，也曾有所触动和收敛，但总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也心存侥幸认为有关部门不会查到我身上，在心底里并没有把这些规定当成严格的纪律予以遵守，受一些风气的影响，还是按惯性去做。”其实，侥幸、从众等都是顶风违纪的表面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意识缺失、纪律规矩意识淡漠。头脑中缺乏向中央看齐的政治意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意义和中央正风反腐的坚定决心，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入脑入心。正如他自己反思：“我老是忙于一些事务，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的把握确确实实放得太松，党性修养缺乏、党纪意识淡薄，没有把党的要求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做什么事情没有好好去衡量一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守纪律、守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让讲政治守纪律守规矩深入骨髓，融入血肉，成为本能”。讲政治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根本保证。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强化党性观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具备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时刻做到头脑清醒、是非分明、

信仰坚定、不失党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恪守规矩，关系到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和作风的弦，时时刻刻拿纪律标尺对照自己的言行，公私分明、行有所止，切实做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切莫“关公面前耍大刀”，心存侥幸。“你不收敛、我不手软”，如果不把纪律规矩当回事，必将自食苦果。同时，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多过问、多提醒，掌握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使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能及时解决，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督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平时总算账，避免算总账”，真正达到“洗澡治病”的效果。

不知交，哥们义气、圈子迷失

齐小平在忏悔录中多次提到：“人生输就输在一个‘贪’字，坏就坏在一个所谓的朋友圈里”。向齐小平贿送好处的老板，大部分都是相互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或者他们引荐来的“朋友的朋友”，其中好几个行贿人都是从公务员队伍辞职下海的原黄埔区公务员。这些建筑公司老板平时与他称兄

道弟、吃喝玩乐，在“讲哥们儿义气”、“重感情”的不知不觉中，从一顿饭、一条烟、一瓶酒开始，逐渐把齐小平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和“陷阱中的猎物”，时时处处替人说话、帮人办事，最终逾越党纪国法，走上不当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的不归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齐小平在一次乒乓球比赛中认识了同在机关工作的申某，后来申某辞职经商，二十多年交往下来，齐小平认为这个人很“耿直、爽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知心人”。2009年6月，越秀区要开展迎亚运整治工程，齐小平主动告诉申某，说所有想参加招投标的公司要入选越秀区企业名库，让他想办法挂靠符合条件的公司参加投标，并特地交代区整治办主任李某给予关照。在申某中标的工程遇到进度款拨付、验收结算等困难时，齐小平还亲自多次出面协调解决。甚至申某的朋友广州市某某建筑设计公司老板敖某想做越秀区的安置房项目，申某也要齐小平给区房管局局长胡某打招呼。他后来说：“我和申某是多年的朋友，就想帮他搞些业务赚钱，当时确实没有考虑他会送钱给我”，可谓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齐小平受贿赃款的80%都来自于这位“好朋友”。申某在调查中表示，他只想利用齐小平赚钱，自己只是在商言商，也不会为齐小平开脱什么，所有问题他很快漂白脱身，早早全盘托出，此前所谓的“多年友谊”消失得无影无踪。齐小平后来幡然醒悟：“现在回

想起来，我对这样的朋友老板还真是未识庐山真面貌，意识不到其比恶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你失去利用价值或者需要保全自身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张开血盆大口肆虐地咬死你！若当初，他刻意与我拉近关系套近乎，我能从中警醒，远离这样的人。没有如果，悔之晚矣”。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商人们之所以千方百计接近官员，目的在于看中官员手中的权力。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用尽各种手段，对官员进行拉拢、诱惑，最终让官员沦为他们经商赚钱的“傀儡”和“工具”。齐小平反省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人接近我应该是有他目的的，但是自己还浑然不知。这种味道、这种意思，有点被人家围猎的感觉，是被他框住了”。要知道，商人投资是要有回报的。收申某的钱以后，齐小平只能碍于情面为他办事，成为了金钱的奴隶，甚至沦为申某的“大管家”。无论是公司经营、工程施工的各种难题，还是自己家里小孩上学、办理证件，大事小事都“吩咐”齐小平去做。申某还做起了“掮客”，他的狐朋狗友有事需要“摆平”，都要齐小平去想办法，真是可悲可叹。

人在社会之中，亲朋之间交往是生活必须。但对党员干部而言，却需要警惕，防止交往脱离正常的范围。齐小平反省说：“自己总觉得人情世故难免迎来送往，对所谓的熟人和朋友潜意识里放松了防范意识，忽略了他是老板、我是官

员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渐渐对他们所托所办之事，既没有认真问清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从规章、制度和超越权限方面去思量，更没有从违法乱纪高度去衡量，组织的要求，纪律的约束，在那一刻，都完全忘记了”。保持政治警觉性是抵制糖衣炮弹的重要法宝。很多党员干部掉进陷阱，与其说“猎人”别有用心，不如说自己丧失警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属于什么范畴的人，就应当在生活中自觉归属，拒绝寻找并不属于你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否则，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为党员干部和企业老板之间怎样打交道指明了方向，划出了底线。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贪心，不以公权谋私利；不能搞权钱交易，坚持公私分明，坚持崇廉拒腐；时刻保持敬畏、保持清醒，远离“围猎”，才能保障自己政治上的安全。

不知亲，家风不正、家庭迷失

亲情，是每个人最深沉的眷恋。齐小平在被移送司法机关之前，深情地对审查人员说：“我奋斗了一辈子，现在什么都没了。我现在唯一的盼头，就是希望出来以后还有个完整的家，有个回归的地方。”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齐小平对家庭的浓浓亲情和对亲情的无比珍惜及殷殷期待。可与齐小

平感受截然不同。的是，在齐小平被审查后，致电家里希望配合组织积极退赃时，却遭到家人们的破口大骂。他的独生女让齐小平“安心去坐牢，不要再连累家人”。他的外甥女也呵斥作为舅舅的齐小平，让其“不要逼家人退赃，不要再发神经！”家里最亲密的人爱钱尤胜于关怀齐小平，无一伸出援手，齐小平老泪横流，悔不当初！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都期盼父母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安享晚年，谁都希望兄弟姐妹可以免于生计的劳累，谁都想为子女提供幸福生活、铺平人生道路。可是，齐小平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爱。他的妻子喜欢逛街购物，他就千方百计捞钱，满足她的各种物质欲望；他的女儿大学毕业待业在家，他就受贿索贿给她筹集“第一桶金”，让女儿自己“做老板”；他的兄弟姐妹遇到困难和问题，他就动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办事”。或许，在利用职权为家人一次次谋取私利时，在接收、索取一笔笔贿赂时，他也曾认为这是在为家人积累财富，也有过为家族造福的功德感和荣耀感。可如今，没有给家人正能量的培养，没有营造良好家风的熏习，他的溺爱放纵让家人爱金钱胜过爱自己，家风不正、亲情淡薄，最终害了家人、误了子女。作为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他入狱之后，家里无疑将陷入空前痛苦和忧虑的境地，家人只得“班房”相见或遥望“铁窗”。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腐败之手，击碎了家庭的幸福。

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家风家教绝非小事，一方面是自身腐败变质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也给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注重家风写入党规党纪就意味着，这是具有刚性约束的纪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家风既是道德规范也是纪律要求，纪律红线不能碰，道德底线也不能破。如何驾驭权力，不让它载着亲情四处狂奔，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意志力和抵抗力。呵护亲情、爱护亲人，“心肠”要硬，规矩要严。只有吃透了严与爱的辩证法，管好自己和身边人，坚决做到不行不义之举，不谋不义之财，不做权力的寄生虫，以身作则，修身齐家，才是真正对家庭和子女负责，对个人政治前途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也才能让家人结益友、行善事，找准人生的航向，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审查人员曾问齐小平：“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齐小平低头喃喃道：“我现在只想回到从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不想要其他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是不属于我的，我还是想要回原来的状态，但已经回不去了……”。迷途的人生，迷失了方向，让人嗟叹惋惜，无比哀伤。

附件 4

错误“规划”人生的规划局长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小兵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因为一时贪念，我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让生我养我的父母蒙羞，让心爱的妻子独自在医院生产孩子，让两个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孩子一出世就看不到爸爸，让整个家庭陷入分崩离析的悲惨境地……”。直到面对组织调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小兵才嚎啕大哭、悔不当初地忏悔道。

2016年7月20日，广州市纪委对外通报，邓小兵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经查，邓小兵存在违反组织纪律，伪造个人档案资料骗取职务、未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违反生活纪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出入高档场所接受业务单位宴请；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和职权上的影响，大肆收受贿赂，纵容家属违规经商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国内名牌大学博士研究生、国家第一批注册规划师、专家学者型官员、在重要岗位担任“一把手”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年轻干部……志得意满的邓小兵，原本满载厚望的仕途

轨迹，却因对权力的规划、对人生的规划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从而走成了一条由喜转悲、由荣而陨的抛物线，其违纪违法的深刻教训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记取于心、警钟长鸣。

“假履历”起步，“规划”出来的政坛新星

邓小兵，32岁担任山西省临汾市规划勘测局党组书记、局长，34岁跻身广州市副局级市管干部，不到40岁就任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成为广州政坛的一颗新星。然而，在耀眼夺目的光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处心积虑、人为“规划”出来的骗局。

2006年，山西省临汾市登出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一名市规划勘测局局长。邓小兵自幼家境拮据，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不已，认为这是一个“鲤鱼跃龙门”，改变人生际遇的千载难逢之机。但是，必须“具备副总规划师资格或资历”的硬杠杠，却硬生生的把他拦在门外。深知自己不够资格报考的邓小兵，却没有“死心”，竟以“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分院代理院长、副总规划师”的假身份蒙混过关获得报考机会，并通过各项选拔，最终进入候选考察名单。在临汾市委组织部赴上海考察时，眼看着局长之位触手可得，邓小兵狗急跳墙，干脆“一骗到底”，通过私人关系让规划设计院配合完成了考察程序。就这样，邓小兵以“骗”的形式步入

仕途，“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临汾市规划勘测局党组书记、局长，成为地级市重要部门正处级“一把手”。

有了第一次的欺骗得手，邓小兵的胆子越来越大。2009年，邓小兵怀揣伪造的履历参加广州开发区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招考。2012年，广州开发区开展干部档案整理工作，邓小兵竟然私刻公章、伪造公文，出具虚假证明，伪称担任过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民营设计企业）规划分院副总规划师，继续欺骗组织、隐瞒实情。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骗官”的那一刻开始，邓小兵就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做人之本、最起码的为官之德，也注定要以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而告终。

“潜规则”敛财，规划领域的腐败蛀虫

以骗官谋取仕途，再用骗来的官捞取钱财。“当官捞钱”，成为邓小兵的为官哲学。2007年，邓小兵在当上临汾市规划局局长之后，就开始敛财，直至案发，收钱捞钱的时间长达10年。甚至邓小兵当年前脚刚到广州开发区报到，后脚就有山西老板跟着过来送钱。据邓小兵交代，在任临汾市规划勘测局“一把手”的两年时间里，他收受多个老板所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上百万元。

“刚上任就捞钱”，邓小兵缘何如此胆大妄为？原来早在

读研期间就在规划领域深耕的他，不仅专业技术功底了得，而且谙熟规划行业各种门道和套路。邓小兵坦言，在山西太原规划设计院工作当“乙方”时，他就经常见到设计单位去承揽项目时，常常需要送给“甲方”一些“好处费”。如果不送，那么再科学的规划、再美好的设计，往往难以顺利落地。邓小兵一叶障目，自以为靠“规划”就可以吃“规划”。当其成为手握“规划”大权的“甲方”，从“乙方”那里捞些“好处费”，在他看来，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于是，从担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总规划师，到萝岗区对口帮扶从化市鳌头镇派驻工作组组长，从广州中新知识城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到广州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邓小兵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想方设法为他在扶贫项目承接、工程款结算、设计测绘项目投标中标等方面提供帮助，大搞权钱交易。

据邓小兵交代，他先后收受包工头林某某、设计单位老总李某某、测绘公司老板范某某、招标代理机构经理谢某某等人贿送的钱财合计两百多万元人民币。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了邓小兵敛财的工具，组织原本是为了发挥其专业优势，但他却把“规划”专长变成腐败专长。

“夫妻店”上阵，规划利益的里外合谋

邓小兵到广州工作后不久，其妻子从外地调入广州开发

区工作，后成为广州地区某高校建筑设计院的一名老师。2013年，邓小兵自从化扶贫回来之后，被任命为中新知识城副总指挥，分管规划设计相关审批业务。其妻随即在萝岗区注册成立了与邓小兵分管工作直接相关的建筑规划设计公司，并出任公司的法人代表、执行董事，集规划官员妻子、规划学院老师、规划公司老板等身份于一身。邓小兵明知妻子在其管辖的业务范围内违规从事经营活动，不仅没有予以纠正反而纵容默许，与妻子悄悄开起了“夫妻店”。

邓小兵常常在与业务单位交流规划方案过程中，刻意提及妻子所开公司，营造其妻子专业水平高，熟悉区内情况等主观印象，实质上就是为自家公司“揽活”。在邓小兵看似有意无意的暗示下，很快就有两家企业找上门来，希望邓小兵妻子的公司能帮忙完成中新知识城范围内有关规划设计项目。多家企业主动找其妻子委托顾问业务，想方设法从他妻子入手，拉近与邓小兵的关系，希望邓小兵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帮助。邓小兵对此心知肚明，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厉令喝止，反而顺着妻子的“规划”越走越远。据他供述，为了帮助其妻拓展业务，他甚至主动找到行贿人李某某，要求安排其名下公司“串通”其妻公司去陪标围标，使得妻子公司最终中标。

经查，2014年至2015年，邓小兵在任中新知识城副总指挥期间，其妻子利用邓小兵的职务影响，以注册的公司和挂靠其他公司的方式，承接了私营公司委托的规划设计

项目上百多万元人民币。

案中窥因 教训沉重

作为广州市引进人才，邓小兵本应肩负着对广州开发区未来规划发展的历史重担，然而他却自毁前程。令人唏嘘之余，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深思。

理想信念沦丧，开启贪婪之门。人生如屋，信念是柱。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邓小兵的落马，利益诱惑只是表象，本质上还是其理想滑坡、信念动摇所致。他一直以专家学者型官员自居，热衷于参加各种规划学术圈、专家圈，对研究规划专业兴趣十足，但对思想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教育敷衍了事、学而不“信”，反而奉行“潜规则”、“钱规则”，理想信念严重偏离正常轨道。从规划技术人员到政府官员，邓小兵在角色转换中没有积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而把工作成就与生活享受联系在一起，仍然把自己当作是技术生意人，忘却了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告诫。一名理想信念丧失、三观扭曲的党员领导干部，一旦掌握了权力，贪欲便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把自己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畸形心理作祟，公权沦为私具。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这

一法则在邓小兵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在领导岗位上，我感受到权力隐藏在另一面的魔力”。“企业老总、私人老板、设计单位，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想方设法靠近我，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忙前忙后，一个决定就可以让他们或喜或忧”。当权力被用作为个人、家庭和小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必然产生畸形心理，导致私欲膨胀，为所欲为。“本来我从山西来广州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不再收钱，但是跟那个公司联系之后，他就请我吃饭，说可以给我什么利益，我就有点心动，后来就安排他们中标”。掌权后的得意忘形，加上夫唱妇和的不良家风，进一步加剧了邓小兵的贪婪。“因为结婚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后来妻子又跟着我来回调动奔波，所以我对她一直有亏欠感，觉得我耽误了她自身的发展，因此当后来她所在的单位有适合的项目可以承接时，我就违规帮助其取得项目，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请她所在单位关照我妻子”。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亏欠家人的补偿心理、收钱办事的交易心理混杂在一起，公权力就彻底沦为了邓小兵谋利的工具。

纪律观念淡漠，心中不知敬畏。银行扎好的百元现钞，每扎1万元人民币，有的装在信封里，有的用黑色塑料袋包着、有的放在礼品袋里垫在烟和酒的下面……8万、15万、30万……，这是邓小兵这几年收钱细节的真实写照。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中央明确提出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

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后，邓小兵仍然不思悔改、继续顶风违纪，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尤其荒唐的是，他学党纪研党规，竟然是为了钻纪律规矩的空子，想方设法规避纪律规矩的约束。纪律和规矩在他心中已经被虚化、异化。他甚至认为中央高举反腐大旗，不过是装装样子、喊喊口号，反腐败很快就会鸣金收兵。凭着之前违纪违法的“经验”，只要做得足够巧妙，就不会露出蛛丝马迹。邓小兵错误判断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不收敛、不收手，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殷鉴不远 警钟长鸣

当前，一些重点领域腐败案件仍然多发高发，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坚定理想信念，走好人生之路。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邓小兵从来把自己当成技术精英、业务官员，忘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邓小兵以及国土规划领域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说到底是因为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反映出不少党员干部思想上无标杆、政治上缺定力，最终抵御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侵蚀，在人生的关键一步迷失方向，步

入歧途，无法回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用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树立良好家风，筑牢廉洁防线。家风在塑造个人品德方面占据着基础性地位，是构筑个人精神家园的第一块基石。家风淳正是干事创业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家风腐化则是为人处世难以承受的负资产。邓小兵及其妻子在利益的诱惑下，不是互相提醒防范，而是彼此默许纵容，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足见其家风恶劣。邓小兵案再次警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廉洁修身，更要廉洁齐家，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常把家庭“廉洁关”，常吹家庭“廉洁风”，常念家庭“廉洁经”，常算家庭“廉洁账”，帮助家庭成员抵制各种诱惑，将腐败拒之于门外。

健全体制机制，根治行业腐败。邓小兵在忏悔录中写道，规划设计招投标从任务确定、招标条件拟定、招标信息发布、投标报名、评标都存在暗箱操作空间。有的在任务确定阶段，相关领导或经办人就可以提前放风给特定的规划设计单位，让其充分准备；有的在招标条件拟定阶段，为特定的规划设计单位量身打造评分条件，行内叫“萝卜招标”；有的在信息发布阶段，有意制造信息不对称，排除竞争者；有的在投标阶段，就已内定“意向”中标单位，再找两家“友好单位”陪标围标等等。近几年国土规划系统官员的“前腐后继”，暴

露出该领域在权力运行和监督上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是致命漏洞。各单位要以案促改，特别是要在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下大功夫苦功夫加强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规划权力运行体系，形成源头反腐的长效机制。

保持高压态势，形成强大震慑。邓小兵持续作案，且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这是落马官员普遍存在的侥幸心态。要打消侥幸心态，就必须对腐败分子持续保持高压，形成强大震慑。当前，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没有变，巩固和强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力度也绝不会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执纪审查重点继续放在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上；要坚决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用好第一、第二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又绝不放松第三、第四种形态，保持利剑高悬、威慑常在，让腐败分子伸手必被捉，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坚决铲除腐败这个致命的“污染源”。

附件 5

错位的追求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段险峰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和影响力也相应增大，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权力观和地位观也悄悄发生变化，对自身价值的评价和追求也已不再限于对社会贡献和事业成就，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套上了权力与地位的光环。”段险峰曾在个人忏悔中写下了这段反思。但是，他的反思来得太迟，思想的滑坡、食欲的膨胀、错位的追求，已经让他在贪腐的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

2016年4月，市纪委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段险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1998年年底至2013年8月间，段险峰严重违反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超过300万元。2016年7月，市纪委决定给予段险峰开除党籍处分，2016年8月，市监察局决定给予段险峰开除公职处分。

错爱，在权色交易下沉沦

“有人沉迷于保龄球、高尔夫、棋牌室和夜总会，享受

声色情趣；有些人满足于恃权自重，盛气凌人，前呼后拥，一言九鼎，享受做人上人，而我则醉心于你情我愿，两情相悦，享受男欢女爱之情。……我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段险峰出身于教师家庭，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他来说，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并让他在学生时代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后，段险峰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30岁成为副处长，36岁成为副局级干部，42岁就官至正局。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妻贤子孝，段险峰有着令人羡慕的美好幸福家庭和无可限量的前途，本应该倍加珍惜，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段“畸恋”，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用手中的权力和靠贪腐得来的金钱为这个所谓的“爱情”买单。

1996年，段险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组织的培养，被提拔为市城市规划局城乡规划设计处副处长。对他来说，走上领导岗位，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本应更加努力工作，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也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自己的女同事黄某，被黄某的美貌和才情吸引，即使自己已经有家庭，也明知黄某有男朋友，他还是抑制不住对黄某的爱慕，很快，两个人发生了婚外情。后来，黄某结婚有了家庭，段险峰并没有放弃，两人一直保持着两性关系。

“西方主义思潮的本质就是个人至上，自私自利，我的的人生观也受其影响，认为与黄某的恋情是对人性自由的追求。”段险峰在个人忏悔中写道。段险峰一直强调的“人性自

由的追求”，以及与黄某之间的“纯洁”爱情，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2002年至2015年期间，段险峰先后为黄某买房支付购房款、装修款上百万元，还为黄某购买了数十万元的家电、家具、家居用品。1999年底，黄某丈夫得知段某和黄某的婚外情后，以此勒索段险峰，段险峰先后给了黄某丈夫20万人民币来“掩盖”此事。靠着金钱和权力，段险峰才有“底气”来维系与黄某这段恋情，“我敢于肆无忌惮地占有并享受黄某之爱，与权力和地位在我身上附加的价值以及我对自身价值的错误评价绝对有关。”

黄某和丈夫离婚后，段险峰更加觉得，要对黄某负起“责任”，他对黄某的“付出”越来越贴心和到位。2008年，黄某赴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段险峰分别在2009年至2010年连续三年以黄某的名义出资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某科研所实验室项目（由黄某的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累计70多万港元；2015年，段险峰再次拿出15万元港元，委托朋友羊某某以羊某某的名义捐赠给黄某的导师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此外，段险峰每年还把一些私人老板、利益关系人赠送的近万元的购物卡送给黄某，或者把数万元的现金给黄某作为“零花钱”。“出于自私之心，想长期占有和享受黄某之爱，我认为仅靠感情投入和精神滋养都达不到补偿和长期占有的目的，我便开始考虑既要为其（黄某）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还要帮助其提高自我发展平台，但要做到这两点，仅靠

我的职权和职务影响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

“替她（黄某）支付的24万购房款，其中5万元是2004年春节前某混凝土搅拌站朱老板贿送的。”“给她（黄某）用于捐赠香港中文大学的75万元港币，均来自某地产老板韩某某的贿送。”“每年送黄某的购物卡，都是别人逢年过节送我的，具体是谁送的记不太清楚了。”……连段险峰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段“错爱”，他不断沉沦，最终迷失了方向。

贪欲，在自我放任中横流

“贪是万恶之源，腐败之根。贪无非体现在权、钱、色三个方面，且三者又经常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段险峰曾在个人忏悔中写道。错位的情感，让段险峰的权力观、金钱观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为了“补偿”和讨好情人黄某，段险峰越来越缺钱，但仅靠他自身的正常的收入无法满足这种物欲需求，于是，他手中的权力渐渐成了他捞钱逐利的“筹码”。

2004年至2008年，段险峰陆续收了一些人以出国和节庆等各种名义贿送的钱款，“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心理仍遭受很大的压力，良心也受到谴责，只好以当时总体社会风气不良，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作为借口自我安慰。”除了自我安慰，段险峰也有侥幸心理，“对照一些腐败典型案例，认为自己虽

然收受钱财，但数额不大，且不存在主观故意……总幻想着党纪国法虽严，但法不责众，心存侥幸。”就像温水煮青蛙，贪欲让段险峰的思想防线一点点瓦解。

2002年7月，36岁的段险峰升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兼南沙规划分局局长，后又兼任南沙国土分局局长，掌握着南沙国土规划的大权，他成为南沙土地项目开发中炙手可热的关键人物，不少老板开始和他“套近乎”，这其中就有某地产公司的老板韩某某。据段险峰交代，2004年底韩某某约他吃饭，以送“汤料”为借口一次性馈赠了20万元的港币，当时段险峰很害怕，先是收下了贿款，但很快就还了回去。但是，韩某某并没有放弃，不断约段险峰吃饭，在交往中加深“朋友感情”，在“嘘寒问暖”中继续接二连三找机会送钱，并不断加码，20万、30万、100万，段险峰收了又悉数归还。

“2006年之前，韩某某跟我的交往都是试探性的，我想主要是维持感情，没有具体的请托。2006年开始，韩某某跟我的往来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当时南沙的国土分局也归我管，韩某某找我主要是土地置换的事，希望推进蕉门岛土地报批……”段险峰似乎也在这种交往中寻找时机，直到2006年初韩某再次给段险峰带来“汤料”60万港币，段险峰最后只退了30万给韩某某，并跟韩某某解释只退一半的原因是公文包放不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段险峰收钱也越来越顺其自然。据统计，2006年至2015年期间，段险峰利用

职权对韩某某在南沙规划审批项目中提供帮助，从而收受其所送款项共计 190 多万元，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在南沙土地开发项目的规划国土审批提供帮助。

防线，在内外作用中崩塌

正值事业上盛年的段险峰，本应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平台和个人专业能力，为广州城市建设描绘更为美丽的蓝图，但他却选择了用权力和金钱堆砌“幸福”、填充“欲望”，让一切美好戛然而止，他的不归之路令人深思。

思想蜕变，漠视法纪。“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而逐步蜕变的人生观是我做出错误选择而违纪违法的内因”。理想信念动摇是思想蜕变第一步，段险峰沉迷于西方的“自由、人性、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满足个人的追求是对人性的解放，就比如他对黄某的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旦发生了扭曲，就会为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不能自拔。作为一个业务型的领导干部，段险峰想当然的认为，只要业务过硬，其他的方面都能够“网开一面”。教育学习不到位，法纪观念淡薄，在段险峰身上尤为明显。据了解，段险峰经常缺席重要的纪律教育，对法律学习也不上心。面对组织调查，他一度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主动索贿，也没有滥用职权、突破公共利益和政策底线，就不是受贿。而且，他侥幸

地认为，法不责众，政治生态环境如此，自己是安全的。

恃权自重，私利至上。段险峰自己在忏悔书中这样说：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加重，社会关系越来越广泛，交往对象越来越复杂，对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和职务影响力认识错位，不能正确区分‘权’与‘事’的边界，认真干事与插手干预的界限，不能正确区分甚至故意模糊领导职责，事务处理和人情交往的关系。”大权在手，段险峰常常觉得，手上权力就是他个人的，他说了算，他经常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协调解决有关矛盾为由，帮助他的“朋友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觉得，只要自己掌握着手中的权力，那么他和那些朋友们就是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可以各取所需。

制度缺失，监督缺位。段险峰长期从事的国土规划领域，一直是腐败问题高发领域，土地出让、规划调整、报建审批、违法用地执法检查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和廉洁风险，即便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仍存在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其次，对国土与规划部门某些重点岗位，特别是领导岗位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在客观上可能会形成一个岗位关注全面、一种事权延伸多头、一位领导干预全部的局面，为滥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力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反思，在深刻教训中警醒

“昨日清明雨倾盆，愁煞囚中戴罪身。万念俱灰心已矣，妻女音容却惊魂”，这是段险峰所写的悔过诗。失去自由的段险峰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的贪腐对个人、对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强化党性，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是好干部标准的第一条。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党员领导干部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浩然正气、坚守底线。段险峰之所以走上了畸形之恋，落入钱色交易的陷阱，主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忘记了党章的基本规定、更忘记了入党时的初心。党员干部要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要求，真正把党章的要求落实到思想上、行动上，树立“四个意识”，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强化观念，遵纪守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纪观念淡漠是段险峰违纪违法的主因之一，在段险峰看来，违纪违法的人多了，别人都没事，自己也不会出事，就是这种侥幸心理，让他的法纪意识越来越淡薄。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就是必须遵守的行为底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强化法纪观念，严格遵守党纪

法规，不越雷池，不踩红线，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加强监督，净化“三圈”。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监督是监督的“弱点”和“盲点”。目前，省纪委已经出台《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对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以外所从事的与职务影响相关或个人生活领域的活动强化监督，着力净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执行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的有关规定，让领导干部自觉净化“三圈”，远离奢靡陋俗，严守伦理道德底线，把握好交友的尺度，不该交的朋友不交，不该吃的饭不吃，不该进的圈子不进，不该去的地方不去，防微杜渐，抓早抓小。

完善制度，扎紧笼子。国土规划领域向来是腐败问题的高发领域，在南沙自贸区建设迎来高潮期的大背景下，国土规划建设的廉政风险防控面临着更重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紧盯国土规划领域中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全面开展政策梳理，建立具有统一性、关联性且适用范围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政策体系；同时，要加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稳定性和刚性约束，从制度上减少规划编制与调整的随意性；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职权设置分类合理、相对集中又独立运作的国土规划管理工作体系，构建权力运行的“防火墙”与“安全阀”，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附件 6

闪闪红星 缘何坠落

——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总经理

赖布克违纪案件剖析

赖布克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母是参加过抗战的离休干部，母亲说他“在肚子里就是党的人”，给其取名“布克”，意思是激励他不忘“布尔什维克”的信仰。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他从广州氮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为团委书记、纪委书记、总经理，39岁成为局级干部，47岁受任市管企业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在此岗位工作直至退休。然而，在工程咨询评估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他滥用“一把手”职权，一方面使咨询公司这棵幼苗野蛮生长，成为财源滚滚但百病丛生的“摇钱树”，另一方面个人也借收受礼金、违规取酬、收受贿赂等疯狂敛财，最终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当年耀眼的红星，就此坠进万丈深渊。

罔顾党纪只向“钱” 野蛮生长终成恨

赖布克违纪案件是国有企业“一把手”以权谋私的典型

案件，其最大特点是利用国家授予的高级资质，乘工程咨询领域“政府转市场”之机，大开违规挂靠分包之门。对于这类因企业“软权力、轻资产”特点不易监管、处于转轨期疏于监管引发的违纪案件，应引起高度警惕。

借口“行规”牵线搭桥，违规挂靠埋下祸根。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立于1983年，前身是应广州乙烯工程项目前期建设需要设立的石油规划办公室，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拥有工程咨询综合类、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政府采购代理等四大甲级资质，其中又以工程咨询综合类甲级资质最为稀缺。工程咨询主要以建设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和申请报告以及前置的安全、节能评估报告等为主。属于政府审批、核准项目的必经环节。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工程咨询业务向社会放开，工程投资量、业务咨询量迅猛增长，新成立的民营咨询公司多如过江之鲫，但却因资质等级不够，无法承接重大项目。另一方面，《行政许可法》、《建筑法》和有关行业规定虽原则上禁止挂靠，但国家主管部门迟迟未对工程咨询行业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在此背景下，初入行的咨询机构为日后申请资质积累经验，往往与具有较高资质的机构“合作”分包业务，或者干脆直接挂靠，成为工程咨询行业内通行的潜规则。

纵观省内工程咨询领域，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资质

种类全、等级高，又有过硬的政府背景，众多民营咨询机构慕名而来，纷纷请求开展合作。起初，赖布克也曾怀着发展公司业务、培养咨询行业人才的初衷，先后为几家民企推荐咨询业务、进行质量把关。鉴于这种合作关系的特殊属性，部分受到关照的私人老板开始给赖布克递送“感谢费”。一开始，赖布克是拒绝的，但在彼此交往增多、关系变得密切后，他的思想渐渐动摇，从一次到两次，金额也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后来是来者不拒。随着感情的熟络，“合作”的手段也不断升级。除以“技术合作”之名违规转包、分包外，他甚至摸索出一套工程资质挂靠的“经典模板”，即以设立分支公司的名义，使民营咨询机构就地改编、“华丽转身”，变成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名下的分公司，为资质挂靠贴上官方认证，代价是仅仅收取营业收入 10%-30% 的管理费，即将违规挂靠变为业务内包，“完美”规避了相关规定。在日渐密切的往来中，赖布克与各位老板呼朋唤友、称兄道弟，十多年间细水长流，共收受财物将近 300 万元，甚至索性把自己的儿子、儿媳安排到相熟老板的企业工作。老板们当然也没有白“投资”，除了借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之名衍生出 4 个实为私企的分公司外，还有一批民营咨询机构众星拱月般围着赖布克，以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信誉背书，开展了大量的“技术合作”，其中难免人员素质参差、良莠不齐，给咨询公司的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

分配提成巧立名目，回扣“炒更”乱象丛生。赖布克在刚到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时，除了市发展改革委委托的项目外，公司一年到头没几个自行承揽的项目，财政拨款除去应发工资外所剩无几。眼看公司怀揣金牌资质，却只能勉强混个温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赖布克指令公司计财部拟定一份咨询收入提成分配办法，将项目收入与个人待遇挂钩，淡化工资收入、强化奖励收入，鼓励多找项目、多赚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力求充分激发员工开拓业务的积极性。在赖布克主导下建立的利益分配格局，单纯以个人收入高低来衡量公司发展的好坏，导致公司上下渐渐形成业务挂帅、利益至上的风气。在轰轰烈烈的业务扩张中，金牌资质只能矮化为赚钱工具。一是**奖金设置“夹带私货”**。提成分配办法在赖布克授意下数次修改，美其名曰“向一线倾斜”，赖布克本人的分配系数却水涨船高，与普通一线员工的待遇差距越拉越大。二是**承揽业务乱象丛生**。在赖布克纵容下，有的部门经理也学起了社会上那一套“游戏规则”，向客户承诺给予合同金额的一定“点数”作为回扣，有的工作人员不惜铤而走险为客户虚增建设规模，目的仅仅是为了替客户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三是**公私不分“炒更”成风**。部分员工更是利用公司的资质资源、设备器材、场地物耗，接私活、办私事，甚至整个部门拉出去“炒更”。项目二部员工陈某某在工作时间以私人名义承揽咨询业务，赖布克不仅未加制止，反而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多次收受了陈某某贿送的现金 11 万元，并论“礼”行赏，提拔陈某某担任咨询公司总工程师副主任。

煞费苦心掩饰高薪，多管齐下化公为私。在公司发展初期，“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薪酬分配方案曾发挥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了市场拓展。但随着员工收入直线上升，工资支出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上不封顶”的漏洞日益显现，实质上已成为公司肆意侵蚀国家利润的挡箭牌。赖布克毫不讳言，当时在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就连最普通的工勤人员年收入都高得惊人。作为市管国企，职工薪酬的畸高，无疑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财政、审计部门来检查时，惊呼公司员工“幸福指数真高”。对这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失衡的不正常现象，赖布克作为企业当家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整改，反而为了让员工的收入状况不被人发觉，与财务人员秘密谋划了隐瞒收入、私自设立小金库的“妙计”。一方面，明修栈道、虚构支出，由财务人员与相熟的私企老板接洽，虚构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与民营咨询机构的合作项目，表面上名正言顺地支付劳务费，暗地里由民营咨询机构留下“成本”，再将大头返还。同时还虚列了五花八门的会议费支出。另一方面，暗度陈仓、截留收入，截留某些不开发票、没签合同的项目劳务收入，截留老板们上交的分公司管理费，以及部分咨询公司自有物业租金，千方百计为小金库拓展资金来源。2004 年至 2013 年，上千万元本应纳入管理的国有

收益和企业利润化整为零，源源不断汇入废弃不用的原财政拨款账户，以及多名员工的个人储蓄账户，并化为奖金、专家费和退休补贴，最终流入个人的腰包。其中又以赖布克个人获取的奖金最多，达 40 多万元。

功成之后未思身退，“退而不休”违规取酬。在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启动企业化改革后，市发展改革委于 2003 年与咨询公司正式脱钩，由主管部门变为联系部门，实际上仅在业务上进行一般指导。其后 13 年间，该公司企业化改革迟迟未落地，均未明确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上级或主管单位，该公司还未建立起真正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缺乏相应内部监督机制，成了断了线的风筝，长期游离在监督视线之外。加上赖布克一手将咨询公司“带大”的赫赫战功，其在公司内部一言九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个人威信不是一般老总可比。其本人也承认，“在一个单位当一把手时间长，容易出现我行我素的坏习惯，短时间开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时间长了，慢慢习惯了，人家说话都挑你好听的说”。某部门经理为了讨好他，甚至不惜自掏腰包以发年终奖奖金名义向其送礼。更为荒唐的是，长期身居“一把手”位置，让赖布克当惯了挥斥方遒的“将军”，“功成”之后不仅未思身退，反而半推半就地留下发挥“余热”。2014 年 1 月，市委组织部发文宣布赖布克退休后，其未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过组织批准，继续以所谓“高级顾问”的名义参与咨询公司管理决策，并领

取等同咨询公司在任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违反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执行中组发〔2013〕1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第3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退休后，不得在原任职企业及其出资的企业兼职（任职）”的有关规定。2014年2月至2015年7月，赖布克除在社保领取正常退休养老金和补贴外，在咨询公司取酬80多万元。直至2015年8月市纪委启动巡察时，才不得不离开咨询公司。

偏安一隅成乐土 肩负重任却忘形

古人云，善泳者溺。探寻赖布克蜕变的轨迹，其深陷贪腐的历程与公司发展壮大同步。本应是咨询工程领域的弄潮儿，到头来却经不住市场大潮冲击，迷乱了自我，弃守了防线。同时，监督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也是其走上违纪道路的重要原因。

思想根基动摇是腐化蜕变根源。细究赖布克蜕化变质的过程，根子还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首先是违背了初衷初心。赖布克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母都是离休干部，家庭给他的党性熏陶非常浓郁，可谓一颗“闪闪的红星”，他也一直勉励自己不忘初心。但到头来造化弄人，“布克”偏偏做了对不起“布尔什维克”的事。该案充分说明，“基因”好，不代表“抗病力”就强；不忘初心，方能得其始终。其次是淡

忘了党员身份。组织上入党，不代表思想上入党。赖布克面对老板双手奉上的感谢时，认为自己帮助过他们，给他们推荐过业务，收点好处也不为过，归根结底，是淡忘了党员克己奉公的基本立场，淡忘了廉洁自律的原则底线，把商品交换规则也放到对权力的运用上来，在义和利、是与非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再次是模糊了自身定位。赖布克也认识到，他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职务、权力都是党和国家托付给他的。但在现实中，他却把忘了把优质资源变为国家利益的职责使命，把国家赋予的资质单纯看作是企业的资源，把使用权异化为所有权，甚至是与商人们交换利益的砝码，最终导致走上贪污腐化的不归路。

组织监督弱化助推个人权威膨胀。赖布克“一把手”任职时间长达16年，凭借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所属领域的垄断属性，承接了大量政府机构委托的财政评审任务，对企业施工款项结算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加上此间组织监督弱化，进一步助推其个人权威膨胀。一是上级组织监督失之于松。赖布克之所以可以自说自话设立小金库，可以自作主张允许私人老板违规挂靠，可以自欺欺人违规分包业务给私人老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级部门监管缺失。2003年，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与市发展改革委脱钩，咨询公司由分管单位变成联系单位，自此一直没有明确上级主管部门，形成了人事关系在组织部、财务监管在财政局、组织关系在机关党委、发改委

进行业务指导的管理模式。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贡献利税虽高，但其“轻资产、重人力”的特点决定了资产体量较小，不能以资产增值保值作为主要考核目标，不易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随着企业化改革进程一拖再拖，主管单位十几年间一直未能落实，导致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为“一方乐土”，赖布克等人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上级监管，常年处于放养状态，越发肆意妄为，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赖布克曾对调查人员多次动情地说：“我好久没有感觉到和党组织距离这么近了”。他坦陈，在企业任职十几年间，很少有上级领导找其谈话谈心，令他感到“很孤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级党组织的监督管理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二是**内部监督失之于软**。咨询公司党组原由赖布克和其他四位同志组成。自2003年以来，党组成员只减不补，至赖布克于2014年1月退休时，只剩下副总经理一个“光杆司令”，民主集中制只剩下“集中”，过组织生活、抓党内政治生活的力度可想而知。据查，直至案发前，公司仅确定由党总支书记联系纪检监察工作，无专人负责推进，更没有成立纪检监察部门。党组织涣散到如此地步，“两个责任”根本无从抓起。

政治方向偏离导致义利观偏差。一把手的政治觉悟，往往能影响到企业员工的价值选择。国有企业姓“公”不姓“私”，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国企领导人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大局观念和更加专业的职业素养。赖布

克曾为公司成长做出相当贡献，但他将企业等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将员工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从而把企业和个人发展引向歧途。正如他所说，“这个公司没有多少资产，充其量就是 1200 多平方米的写字楼和几台汽车。我们占用的公共资源除了场地，就只有水、电和电脑中的信息，其他都要靠我们的知识、智慧去创造。我们只要靠脑力挣到钱，能保住这 1200 多平方米的写字楼不流失，钱怎样分都不为过”。甚至对员工宣称“每年我们公司的税收超过 6 千万，我这个企业已经算够意思了”。治企方向的迷失，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也深受其害。2011 年，经赖布克批准，与其相熟的广州某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与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部分亚运工程项目造价咨询工作违规分包给该公司，该公司员工彭某某在从事上述工程的结算复核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240 万元、港币 2 万元。经彭某某投案自首，海珠区法院以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23 万元，并追缴其违法所得。该案件一经曝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给公司的金字招牌蒙上了阴影。

法律观念淡薄使其奉行“潜规则”。本案违纪事实发生期间，正是工程咨询领域向市场放开，众多原来“红顶”工程咨询机构转行成为乙方的改革加速推进期。由于工程咨询领域情况不断发展，立法普遍存在滞后性。很长一段时间里，

仅有《行政许可法》、《建筑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对该领域作出笼统规定，尚无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工程咨询行业的管理规范进行统一规定，的确如赖布克所说，“国家层面没有一个关键的法”。在此情况下，更需要企业领导者从严掌握已有规范性文件，吃透法律原则和政策精神，自觉从严把握工作尺度，以一颗公心推动工作，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方能有效规避法律风险。但遗憾的是，赖布克只看到行业的潜规则，漠视了明规矩；只顾得上看眼前的利益，忘了党纪国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最终倒在了阳光照不到的灰色地带，倒在了对法治精神的漠视上，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谋取私利的主观动机占了上风。

拒腐防变筑根本 正本清源返初心

党性修炼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反腐倡廉不能“星星点点”，应当全方位、持续性高压推进。赖布克违纪案件告诉我们，思想建设和制度监督永远在路上，要同步推进，同向发力，方能立根固本、正本清源。

必须把监督“一把手”作为国企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要执行好落实好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重点强化对企业一把手在选人用人、重大决策、违规干预和插手有关事项、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要落实约谈一把手制度，由一把手约谈一把手，由对口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和业务监管部门领导对企业一把手开展谈心谈话，及时关注思想动态。要重点关注在同一企业长期担任“一把手”的领导干部，以有利于企业发展为原则，健全企业领导干部轮岗交流制度，推动优秀经营人才“一池水走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必须把压实“两个责任”作为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落实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落实主体责任层面，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成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切实担起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根据分工落实“一岗双责”，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员积极参与管党治党工作，形成失责必问责的压力传导效应。在落实监督责任层面，进一步强化国企纪检机构规范化建设，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纪检监察，围绕企业经营工作重点和监管难点开展效能监察，重点健全完善“三重一大”决策、财务、招投标等制度机制，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实效，推动企业经营效能提升。

必须把加强监督管理作为企业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手段。要进一步完善国企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和完善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指标体系，特别是针对以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为代表的“重人力、轻资产”企业，将对该类企业经营业绩、收入分配作为考核重心，将考核工作做深做细。要用好审计手段，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第一道防线”作用，探索开展事中审计，努力将问题发现在前端，消灭在萌芽。要继续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充分发挥国企巡察纳入市委巡察后工作层级更高、视野更广、力量更强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巡察力度、创新巡察方法、提升巡察实效，以持续巡察释放高压严治成为常态的信号，确保国企巡察工作不变向、不松劲、不停步。

必须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推进国企改革的内生动力。2013年8月，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摘掉石油规划办牌子，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告一段落。今年5月，经市委常委会和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决定，将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给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国发），指明了广州加快国资布局结构优化、加大资本运营力度的国资改革方向。建议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改进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严格规范履行出资人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强化权利责任对等，保障有效履职，进一步提升企业运行效率、优化企业效益。

